

基督教大学 与 国学研究

陶飞亚 吴梓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吴梓明主编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第一辑)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陶飞亚 吴梓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福州

丛 书 主 编：吴梓明

丛书责任编辑：黄 旭

本书责任编辑：陈天正

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第一辑）

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陶飞亚 吴梓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27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六印路30号 邮编：350011）

850×1168 32开本 13印张 314千字 2插页

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334-2595-2/G·2102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差错，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个时期：即唐代的景教为第一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时期；明代的罗马天主教为第三时期；及至清代的基督教为第四时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始自 19 世纪，英人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 1807 年来华传教之时。由于中国当时采取闭关政策，严禁传教士进入境内传教，马礼逊牧师只得在马六甲开办一所教会学校，时为 1818 年，该校名为“英华书院”。办学之初，马礼逊的理想有二：一是为促进欧洲与中国语言文学上的相互沟通，让欧洲人士可以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也让华人可以学习英语，接受西欧文学与科学成就；二是透过学校教育，促进基督教思想在东亚和平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大陆兴办学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传教的热诚，要促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目因而剧增。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中国现代教育》一书的记载，1918 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已达 6000 所，学生超过 15 万人，分布如下：

学校类型	数 目	学生人数
幼稚园	15	3, 196
初级小学	5, 276	133, 826
高级小学	575	19, 605
中学	233	12, 533
专上学校	28	1, 499
师范学校	56	不详
神道学校	31	985
职业学校	40	1, 409
孤儿院	49	1, 544

基督教教育事业因此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幼稚园、中小学、师范学校、以至大学及研究院校，先后有一百多年的岁月，在中国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至深且巨。今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交流史，甚至是近代中国政治史、近代科学发展史、法律史或建筑史等，都可以在不同层面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与基督教有关的课题。至于基督教教育的资料也逐渐地成为近代学者所留意和重视的目标，并作为他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80年代开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厚，尤其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更有显著的成就。1989年6月，在武汉举办中国40年来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对国内基督教教育史研究有如下评价：“无庸讳言，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

义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抨击。”他接着补充说：“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及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多次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即如1991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研讨会”；1993年10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94年3月在四川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正是反映出中国学者正视过去的基督教教育事业，重新肯定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成果。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教授在他的近著《中国教会学校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品”。至于现代学者应如何看待基督教教育问题，高教授认为“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与总结。……既否定教会教育中的消极因素，又肯定其值得参考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对其办学成绩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换言之，国内学者已积极采取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从事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

为了肯定国内学者近年研究的成果，以及进一步推广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研究，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决定出版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促进会成立宗旨有三：一、联系香港及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工作者，并藉资讯促进彼此之交

流；二、推动教会关注宗教教育，加强联络网；三、普及基督教教育研究的成果。该会自1989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曾积极接触从事教会工作或教育研究的信徒和学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达至相互的交流、促进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分别举办学术讲座、座谈会、训练课程、研讨会外，还有出版《通讯》和编撰《迈向九十年代的基督教宗教教育》专书等工作，备受香港教育界尊崇。

至于国内联系方面，近年经常主动与国内学者接触，参与国内举办有关基督教教育各种学术研讨会，由是加强两地学者交流往来的机会。本丛书的出版计划缘起于1994年3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其中一些来自大陆不同地区和香港的学者，相聚间谈起国内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尤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专书更少。鉴于现代中国社会极需有较客观、更科学化及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应在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课题方面作出深入研究。有见及此，学者建议彼此携手，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以补这方面学术著作的不足。于是各位学者推举本人为丛书的主编，负责联系大陆、香港两地具有学术水平、专门研究基督教教育的学者，并策划有关出版事宜。本人适任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主席，蒙学者们错爱，遂答应肩负出版丛书的重任。返回香港后，本人先后联系大陆、香港学者共八位，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洪宇博士、山东大学历史系陶飞亚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高时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副教授、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新宪先生、及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李志刚博士。他们均同意参加此项计划，并约定分工撰写下列七册专著：

（一）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 (二)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 (三)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 (四) 高时良：《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事业》
- (五) 周洪宇：《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发展》
- (六) 李志刚：《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出版事业》
- (七) 谢必震：《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

这项丛书出版计划，标志着大陆、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丛书的特色除了由两地学者共同撰写外，更是十分注重客观的研究及事实的陈述，尤其是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过往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1807—1952），在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基督教教育（包括教会或差会所办之中、小及大学机构），以及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各位作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去探讨，目的是要将基督教教育过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作出客观的论述和阐释，冀能引发更多学术思想的交流。本丛书为能符合一般学术著作的要求，各书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以便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丛书得以顺利完成，实赖各位作者的衷诚合作，不负所望，完成艰苦的撰写工作。1995 年初，适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学术访问研究，藉此难得机会，我们恭请章开沅教授执笔，为丛书作序，获赠鸿文，使丛书增添无限光彩，谨此衷心铭谢。

本丛书能如期出版，我们更须感谢香港圣公会诸圣堂等慷慨捐助教育专款作为丛书出版经费，并蒙福建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乃底以成，谨此志谢。

吴梓明

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

1997 年 5 月 21 日

总 序 二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源远流长且具有普世性的重要宗教之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也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其间虽然多经严重挫折与长期停顿，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间，又复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基督教的信徒虽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佛、回、道等业已完成本土化的各大宗教，但由于其兴办的各项事业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体，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亦未可低估。

教育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重要部分，除了神学教育外还包括各个种类与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世俗教育，而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正是世俗教育。这不仅是就学校和师生总数而言，更重要的是世俗教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直接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可讳言，早期的较低层次的基督教教育，多半是为传教或培养宣教人材而兴办。其中有些草创阶段的学校还具有救济与慈善性质，当然救济与慈善也被视为传递福音的信息，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由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在华传布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与庇护，许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而且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所以“中华归主”之类的口号自然会受到中国民众的厌恶与抗拒，被解读为西方侵略者“征服中国”的同义词，乃至激起 20 世纪 20 年代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而基督教各类教育事业亦曾受到严重的冲击。

但是，与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存在着冲突与融合、排斥与接纳两种趋向一样，上述情况只是基督教在华事业遭遇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逐渐加强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顺应趋向，与此相应的则是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基督教“自传、自治、自养”的主张，以及其后“本色神学”探讨热潮的兴起。历经多次反复的激烈碰撞乃至对抗，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以各级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为标志，基督教教育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和知识化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其利弊功过在基督教内诚然有激烈的争议，因为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教育功能的迅速彰显与宗教功能的日益淡化。但从基督教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自身发展而言，唯有世俗化才能赢得政府与民间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否则便很难承受公立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的强力竞争，甚至连继续存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前些年我在美国教书时，有的天主教大学知道我正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便邀请我参加座谈会。我曾谈到中国教会大学之所以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它们的决策注意到：（1）努力满足社会需要；（2）利用有限资源，着力办好两三个领先于全国的有特色的专业，决不追求“大而全”。这些天主教大学的同事对此备加赞赏，因为他们的学校也正面临类似的困难抉择，而从学校自身来说，存在与发展毕竟是性命相关的首要问题。后来我到台湾东海大学访问，知道夜间部的创办对该校的发展厥功甚伟，但却受到有些教会人士的指责，称之为“不务正业”、“偏离了办

学宗旨”。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世俗化问题的争议在台湾的延续。

但无论如何，世俗化毕竟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增添了活力，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虔诚而多少流于偏执的基要派必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福音的传播主要得靠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颇为近似传统儒学所一贯提倡的“内省”。但现代神学的诠释早已多元化，把基督教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溶于“与人民对话”之中，也未尝不能促使基督教得到复兴，至少是可以发扬基督教文化的优良部分。或许可以说，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教育才能对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吴梓明博士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经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正好为我们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套重要的参考书。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基督教教育研究的学者，他们分别从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文化事业、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出版事业、近代妇女、社会服务等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些选题虽然未能包括基督教教育的全部内容，特别是没有专门论述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但是大体上涵盖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方面。因此，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对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将可获致比较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

我对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侧重于高等层次，深感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十余所大学很有成绩，在专业人材培养与新型学科的开拓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仅就教会大学的教育功能着眼，它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教会大学相比较，自有其优胜与成功之处。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所曾指出，教会大学已经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

用，不仅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材，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而且它们的校园、建筑、设备、图书乃至留校服务的师生，仍然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同时，教会大学还留下许多成功的或失败的办学经验，这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只要加以正确总结，便可成为当前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1979 年以来，由于出国机会较多和任职学校的历史渊源，使我得以结识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教会大学长期服务的教职员及其子女。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虽然在 1950 年前后离开中国，但绝大多数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以燕京大学夏仁德教授 (Dr. R. Sailer) 为例，他不仅敢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公开同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新中国代表握手祝贺，而且还不顾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野蛮行径。1982 年秋天，我有幸在华盛顿郊区他的儿子家里小住数日，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第二代”，当时正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繁忙的律师业务之余，尽心尽力地推动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们曾一起满怀激情地大唱当年流行于教会大学校园的各种歌曲，包括迎接解放的革命歌曲。歌声使我们回到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歌声也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已久的固有情谊。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还是通过中外历史研究的心得，我永远相信世界上的好人占绝大多数。对于那些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教会人士，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以应有的尊敬。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题外”的话，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评价常失于偏颇，而其实对它们的切实研究非常不够，甚至缺乏起码的了解。现在，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力求

客观地、也更为超越地研究这个历史课题，使人们获致比较符合当年实际的全面理解。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令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将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是为序。

章 开 沅

于香港马料水客舍

1995 年夏

导 言

近代史上，中国基督教大学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现在逐渐被学术界所认识了。^①不过，人们对这些大学的学术功能的认识，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介绍和教授西学的机构，它们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曾起过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常常被它们在输入西方的宗教、科学知识和教授西方语言方面的突出功能遮没了。

因此，这方面的探讨即使在对中国基督教大学早有研究的英语著作中也不多见。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组织撰写的一批关于基督教大学的著作中，可能由于作者更重视记录学校的全面情况，特别是西方人在学校中的活动，对教会大学的国学教研谈得不多，即使论及也是相当简略的。在后来的关于教会大学的学术著作中，鲁珍晞(Jessie G. 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和魏思特(Philip West)的《燕京大学与中西文化》都比较早期地涉及了这个问题。^②1995 年由北京大

① 本书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基督教大学或教会大学这两个名词，即本书所指的这类大学不仅包括了基督新教也包括了天主教在中国办的大学。

②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学出版的陈毓贤的《洪业传》则记载了一个在教会大学中国历史文化学科的建设方面做过大量工作的燕京大学教授的生平，展示了当年燕京在开展国学教研方面的努力。^①但是总起来看，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对这个方面的活动始终没有展开探讨。

近年来关于教会大学历史的中文出版物中，张寄谦、陈时伟、王运来、何建明、陶飞亚和刘家峰等先后论述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和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活动，表明了随着教会大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接触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特别是教会大学档案资料之后，对这一个领域的探讨在不断深入。但是，如果把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它们在这方面的活动，还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方面的活动不仅牵涉到基督教大学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性和民族性的问题。后者在国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都不会引起激烈的争议，而在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大学中则完全不同了。早在清末，强调神学、重西学、轻中学一直是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为人诟病的缺点。在 20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教会大学轻视中国文化的批评更是一时人言汹汹，认为这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种突出表现。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立案时，加强中国文化的教育也就成为一项特别的要求。一直到 50 年代，在因抗美援朝而激发起来的批判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运动中，仍然隐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是否重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是与教会大学“文化侵略”的恶溢联系在一起的。

^① *A Latter 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此书也有中译本。

那么，认为这些大学轻视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呢？作为办在中国的大学，它们究竟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索的出发点。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提出西方学者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来考察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的过程。如果注重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中国“内因”这一点也能为我们所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在考察教会大学历史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既看到教会大学发动者们的动机和要求，更注意到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实际结果呢？进而言之，即使是教会大学创办者们的动机也不可能完全从自己的要求出发，因为文化教育的对象是人，高等教育面对的是具有相当认知水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人，他们与学校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学校教育必须满足他们求知与走向社会的要求。因此，教会大学的办学目标中必须包括这些青年人的目标。事实上，教会大学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一是西方的教会，一是中国社会。就前者而言，教会大学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西方教会，在政策上当然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后者而言，教会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要走向中国社会，因此它们的教育方针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可以说是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近代中国的学术变迁，就业市场的需求，各类大学之间的竞争，中国的政治运动等等都会影响学校的发展进程。其中，反对“文化侵略”的运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其实，反对“文化侵略”的口号，正如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流行语，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一样，它是中国的文化教育领域受到西方冲击后在知识界激起的一种强烈反响。多年以来，学术界在分析和评价西方在华文化活动时，一直在使用或者在部分地试图否定这个政治断语，但却忽视了这个口号本身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注意到了它的政治含义，却忽视了它

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反对“文化侵略”到底反对什么？反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吗？显然不是。按当时的资料来看，它的内容是：第一，反对外国教会控制中国教育，并且形成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教育体系；第二，反对教会学校宗教与教育的不分离；第三，反对教会学校宣扬西洋文化轻视中国文化，造成学生仰慕西方的心理。借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教会大学到底为谁培养接班人，是为中国还是为西方？是为教会还是为社会？这种提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绝对，也可能有点“社会主义研究还幼稚的结果”，^①但对教会大学的培养方法和方向上的问题是一针见血地提了出来。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内容之一。不过，学术界过去往往注意到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不太关注运动之后静悄悄的改革和变迁。

因此，本书的任务就是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讨论那些不太为人重视的、但却在其自身历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活动。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全面认识教会大学的学术功能，认识教会大学中中外学者的努力提供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其学术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的讨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13 所新教大学和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讨论的内容限定于教会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是 20 世纪以后人们习称的“国学”。本书将按历史顺序展开论述：第一，将考察早期传教士、教会学校到教会大学究竟是如何对待中国文化的；第二，分析它们的教学和研究政策前后所发

^① 田汉：“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的批评”，《少年中国》三卷九、十期，1922，4—5，转自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981年版，第一集第十一册，第486页。